

殷墟考古——

塑造中国考古学的鲜明个性

杨雪梅



核心阅读

以学术课题为主导,多学科联合攻关,是殷墟考古的传统。从碳十四年代测定、动植物考古、残留物分析到环境与入地关系、资源与生业技术,科技一直助力殷墟考古。

殷墟对年轻人有无穷的吸引力,不仅因为它可以让你研究一生,更因为殷墟考古塑造了中国考古学鲜明的个性,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优良传统。

从安阳到北京,最快的高铁只要1小时50分钟。不过除了每年年终的田野考古汇报会以及一些必须参加的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考古人,一年有300多天都“长”在洹河两岸,大家称他们为“殷墟人”。

“听说新发现了一个象坑?”“消息挺灵通啊。梁思永先生当年就发掘过两个象坑,我们这个坑是一头完整的小象与3个完整人骨摆在一起,也许是驯象人。”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商代考古新进展”是4个分论坛之一,听者云集,来自殷墟的考古新进展,持续传递着3000多年前古老文明留下的讯息,深化着商文明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研究。

殷墟考古不断取得新突破

牛世山在北京大学读硕士时的研究方向就是商周考古,1993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时,导师李伯谦对他的要求是田野考古与学术研究齐头并进。2018年,在各级文物主管部门的推动下,殷墟保护范围内原则上不再批准基建项目,学术目标明确的主动性考古成为主流。2020年殷墟王陵区考古工作重启,牛世山担任领队。

经过两年多的考古,“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代遗址”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商王陵为中心的整个洹河北岸,是殷墟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考古发现距今2500多年的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周围有障壕,这次殷墟王陵区陵墓障壕的确认,将此规划上推到商代晚期。以新发现的两个围沟外边界为基准,王陵区的范围变大了,从过去的10万平方米扩展到16万平方米。在王陵区西南部探明的西周早期遗址,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为我们研究西周灭商后的状况提供了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高度评价此项考古。

牛世山将最新考古成果标注到整个王陵区的考古地图上,我们就看到了这么多年不间断的探索。“你看,这里是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这些是上世纪50年代重启后的发掘,还有1978年和1984年的勘探与考古,这些花花绿绿的则是我们这几年探出的西周墓葬。这是两条蓝色的围沟,东西并列,各自闭合,是商王陵的障壕……”

这些年殷墟考古不断取得新突破。传统的小屯官殿宗庙区新发现大型池苑、水道及与之相关的建筑遗迹,池苑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通过水道与洹河联通,改变了以往对殷墟官殿宗庙区整体格局的认识。

殷墟内部的道路系统不断被揭示。殷墟官殿宗庙区南约1公里处,发现2条直通官殿区南北向道路,洹河北岸发掘出宽达15米的大型道路,道路之上有清晰的车辙痕迹,道路两侧密集分布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诸多发现为进一步探索殷墟城市布局、族邑分布提供了重要线索。

以学术课题为主导,多学科联合攻关,是殷墟考古的传统。从碳十四年代测定、动植物考古、残留物分析到环境与入地关系、资源与生业技术,科技一直助力殷墟考古。“在洹河北岸,通过对铸铜作坊内土壤的检测分析,发现铅含量很高,甚至对当时的动植物产生影响;通过对制骨作坊的骨料做鉴定,知道骨料主要为黄牛、鹿等的肢骨以及鹿角;通过对墓葬出土的人骨进行病理分析,可以看出劳作和手工业活动对骨骼造成的影响。”新一任安阳工作站站长何毓灵介绍。

从1898年发现甲骨文到1928年10月开始科学发掘,殷墟考古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几代考古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虽然将商代晚期长达270多年的历史一点点揭示,一块块拼接,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对于殷墟、对于从事商代研究的考古人来说,探索是没有止境的。”何毓灵说。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登高望远

9月中旬,中国考古博物馆开馆一周年时,面向公众举办了考古工地视频连线。洹北商城考古队第三任领队王迪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正在发掘的洹北商城官殿区一号基址。一号基址是迄今为止已确认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1999年发现洹北商城后,2001年清理出城内的I号官殿基址,当年没有对东北角、东南角进行考古发掘,2023年开始的考古明确了主殿东端、东耳东、东虎北部台基范围和柱网结构。

“这是十几年前荆志淳老师的官殿基址的线图,我们把东虎部分完善了,对比可以看到,东虎为外侧双柱墙单面廊结构,与西虎无柱的平台式建筑截然不同。以往钻探认为官城内的夯土基址应是统一规划建成的,但最新的考古说明,在营建之前,这里已有建筑。”王迪说。

2018年起,安阳工作站里来了年轻人,3个博士两个硕士。对此,没有人比何毓灵更开心了,“他们都有很好的学术积累,有过扎实的实习经历,而且都非常热爱殷墟。安阳工作站的技师们也很有经验,再加上长期在工作站做陶器修复、文物整理、绘图拓片的修复人员,还有每年来的各大高校考古专业的实习生,队伍拉起来有上百人,可以扎扎实实开展各项考古工作。”

王迪和杜博瑞两个博士跟着何毓灵在洹北商城考古。1984年出生的王迪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大四的时候由老师带队到小司空实习,从此和殷墟结下了缘分。“之后是保研、读博、到国外读书,但寒暑假我都会泡在各种考古工地,所有的经验都是在遗址里泡出来的。”王迪说。

田野考古是一项异常艰辛的工作,每天都可能面临新情况,需要考古人动用全部的知识经验和判断。“洹北商城发现的四合院建筑非常多,建筑形式大家都知道,但

是院里的情况是不知道的,因为当时的地面很难找。现在这个建筑台基保留下来了,有20到30厘米的高度。即使有了当时的地面,也不是想清理就能清理出来,因为完全没有路过的痕迹。土里找土,真是难。我们就想做一个实验,看看有过踩踏活动但没有形成路面的情况如何辨识出来。”王迪说。

原来为了防雨遮蔽起来的探方全部揭开了,工作站邀请在殷墟实习的各高校的学生和已经退休的刘忠伏等老同志到现场。这也是工作站的传统,有重大的发现和最新的成果,都会请大家来围观,说说不足,讲讲思路,指点迷津。参观完毕,王迪和技工们收工前开始对遗址进行覆盖,大家有条不紊地将宽大的防雨塑料布以合适的松弛度盖在遗址上,边缘地带又用沙袋压严实,“今年春天以为雨季不会很早就来,有一次就没有盖严实,结果晚上被风吹起来了,又下了雨,好多剖面壁被打得坑坑点点,心疼死了。”作为领队,工地上的事情,王迪都不敢怠慢,“在探方周边筑挡土墙、开挖排水沟,必要时搭建防护棚、遗址一旦进水及时使用水泵将水抽出……这都是工地开工前需提前规划的。尤其是雨季来临前,要做好一切安全措施。”

李潇樱跟着牛世山在王陵区考古。1997年出生的她本科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年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接着就来到了殷墟。2023年底的田野汇报,李潇樱第一次代表自己所在团队汇报王陵区新发现的商代大型动物坑,“有19个是马坑,还有鹿坑、圣水牛坑等。完整的圣水牛坑为殷墟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完整的鹿坑以往也极少见,4只鹿交错挤压,年龄各不相同。这些动物坑中都发现有铜铃。此次发掘为多学科合作提供了丰富的检测样品,也提供了过去不知道的遗迹现象。”这就是考古带来的快乐。

牛世山正沉迷于和年轻人一起研究制作各种正射影像。打开电脑,一帧帧展示不同发掘时间、不同发掘区域各类遗迹影像。“你看,无人机数据收集的质量好坏

直接决定了后期正射影像的质量。阳光太强时拍出的照片会导致正射影像偏白。现在借助软件可以制作遗迹的数字高程模型。器物也是,通过它的正射影像,可绘制准确的数字线描图,也为文物的保护及修复提供支撑……”

“带新人,技术可以慢慢教,但理念要先传授。夏鼐先生一直强调,考古人必须到现场搞清楚很多东西,既要学会认土、找边、剥骨架,又要学会照相、绘图和测量,包括文物整理、修复,这个传统一直坚持到现在。”牛世山说。

2023年底趁着回北京参加所里的田野考古汇报,王迪他们这批年轻人去看望了对殷墟考古作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香先生。不久后,郑先生去世了。如今她的所有手稿、当时拍摄的文物照片的底片等都悉数送到了安阳工作站,正在进行整理。殷墟对年轻人有无穷的吸引力,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这么大的遗址,有这么好、这么多的夯土建筑,有各种复杂的遗迹现象,可以让你研究一生,更因为殷墟考古塑造了中国考古学的鲜明个性,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优良传统。其中有太多不能忘记的名字——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高去寻、夏鼐等第一批中国考古学家,安志敏、郑振香、杨锡璋、刘一曼、徐广德、刘忠伏、孟宪武、唐际根等作出突出贡献的考古人……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理应厚积薄发。”王迪说。

当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人流如织。这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今年2月26日开放后,不出意料地成了网红打卡点,目前参观者已超过130万人次。“暑期人最多。老人、儿童、学生,都是免费参观的。”考古不易,展陈更不易,博物馆执行馆长岳占伟深有体会,“商王朝发展了以青铜礼器为主的礼制,构建了以甲骨文为特色的东方文字体系,是3000年前东亚文明的代表,没有考古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文献来想象它的辉煌,现在观众可以通过青铜器、甲骨、玉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4000件(套)来自持续考古发掘的文物,近距离感受那个消失的文明。”

岳占伟1997年就来到了安阳工作站,是实验室考古的推动者,他隆重向大家推荐“车辚马萧萧——殷墟车马遗迹展”。这是一次性展出商代马车最多的展厅,从殷墟历年出土的上百个车马坑中选择了23辆车马放在一起矩阵式展示。殷墟绝大部分都是两马拉车的形制,包括带着长仪仗杆的仪仗马车、出行田猎的乘车、随葬兵器的战车等。“中国最早的成熟马车出现在晚商。上世纪30年代在安阳曾发现过几座殷墟文化时期的车马坑,但车子的木质均已腐朽,仅剩下零散的车马铜饰。1950年,夏鼐所长在辉县琉璃阁发掘到战国时代的一座大型车马坑,和技师一起搞清楚了车子的木质结构,复原了车子的原状。这项神奇的技术也成为我们的传家宝,希望观众未来有可能在展厅看到考古工作者发掘车马坑的过程。”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你,54号大墓是你发掘的,我们刚看了与它相关的专题展。”一名观众热情地向何毓灵打招呼。“这个展览几乎将亚长墓出土的文物全部拿了出来,我们也致敬了安阳工作站的修复团队与科技团队。”何毓灵说。

54号墓的牛尊刚出土时,腹部、四肢已碎成多块,甚至有部分缺失,通体锈蚀,挤压导致多处变形,经“最强修复师”王浩义寻找残缺、校正变形、复制补缺、焊接修复、做旧等一道道复杂工序,才有了今天完整的模样。讲好故事尤其需要科技考古。做体质人类学分析的王明辉从残存的头骨、四肢骨等分析出墓主人35岁左右,身体共有7处创伤,6处集中于身体左侧,多为刀斧类锐器砍伤。青铜器专家刘煜用变频X射线探伤机对青铜器进行扫描,了解青铜器内部构造和损伤程度,还意外找到了铭文。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发现陶器中有残留的枣子果壳,铜簋内有烹饪的谷物,还有当时流行的用来防腐的花椒。

还有大量考古发掘的文物、遗址和遗迹现象没有陈列。殷墟博物馆只是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部分,观众还可以到官殿宗庙区、王陵区观看其他重要遗迹,持续的考古、深入的研究还将提供更多的展示可能。

通过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工作,为更好赓续中华文明提供借鉴,这是考古人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考古人既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又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近日在故宫博物院开展,380件(组)文物意在揭示儒家思想在塑造中国文化中的独特作用。

观众首先进入的是第一单元“溯古寻儒”。我们试图从中国上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找寻儒家学说产生的社会基础。

展出的文物有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距今两万年以上的陶容器。研究者认为这些陶器是整个东方世界陶器的源头,我国先民发明、烧成陶器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人类从被动利用天然材料到改变天然材料并加以利用的划时代性进步。兴隆洼文化的玉玦、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又分别从礼乐文化和乐器两方面向人们展示中国礼乐文化的源头和久远的历史。这既是中华文明创造性的突出表现,也是中华先民贡献给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源于良渚文化的玉琮,在石峁文化、陶寺文化中继续出现。来自东方的陶鼎逐渐成为中华礼器的重要元素,进而成为王权的象征,再对比夏商周时代的青铜、玉石质的礼乐器,以及宋代的大晟钟、清乾隆时期的编钟、玉编磬,展示了中华文明代代传承发展的线索。从新石器时代写、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和文字到金文、石鼓文和简牍,可以看出文字的发展逻辑,而出土于里耶古城的“更名方”简和秦始皇诏令权、量等文物更是秦代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的实证。

从新石器时代重瓣花架式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格局,我们可以明白,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分布和影响区域的扩大,文化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已开始了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继之而来以青铜文明表现商、周文明和秦汉的统一,正是中华文明传统的凝聚力和统一性的自然延伸。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000多年前的智者,正是通过周代以前文明的沿革、损益的情况,明确指出夏商周文明的连续性,并进而指出千秋百世后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铁器时代的到来和生产水平的发展,极大冲击了旧有社会秩序,出现了所谓的礼崩乐坏,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及诸子学说百家争鸣就是在这一社会剧变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大约同一时期在世界主要文明区域,也涌现出众多伟大的思想家。这些中外思想家在总结过去、思考未来之路,其思想对社会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朝建立,为了长治久安,重视政治文化和思想理论建设,儒家学说因倡导包容、人世和遵从社会秩序,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成为国家的首选。经西汉近百年的努力,形成了一个全新而且是统一的汉文化。

第二单元“化成天下”展示儒家思想在塑造中国文化特质方面的作用与价值,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华文明包容、人世的特点。单元选名语出《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但何以化成?即在于人的努力和教育的成功。展出的汉画像石图像,既有孔子问道老子、项橐的场景,也看到周公辅成王的画像,“好古”“敏求”向古人学习、向他人学习,孔子的思想基本是对上古以来的归纳学习,是在总结先人成败教训后的“述”。孔子之后,贤达辈出,儒家思想代表的中国哲学、伦理才得以传承发展。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既是儒家思想在各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表现,也是儒家思想因时而变的结果,表现形式虽异,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包容、人世思想一直居于主流。

在展品中,通过清宫收藏的西洋风景玻璃画、雍正时期艺术品生产中学习西方透视学的技法,以及把西方生产的天文仪器等列为国家标准礼器并编入《皇朝礼器图典》,表明近世以来,中国社会在一些方面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包容。从日本大阪美术馆借来的明星展品《伏生授经图》相传为王维所作,讲述经秦人焚书后博士伏生以一己之力传授《尚书》使中华文脉得以延续的故事。七块燕平石经,正始石经残碑,则诉说着印刷术盛行于前东汉、曹魏官府推广教育的功业,以及教育、知识传承之路的坎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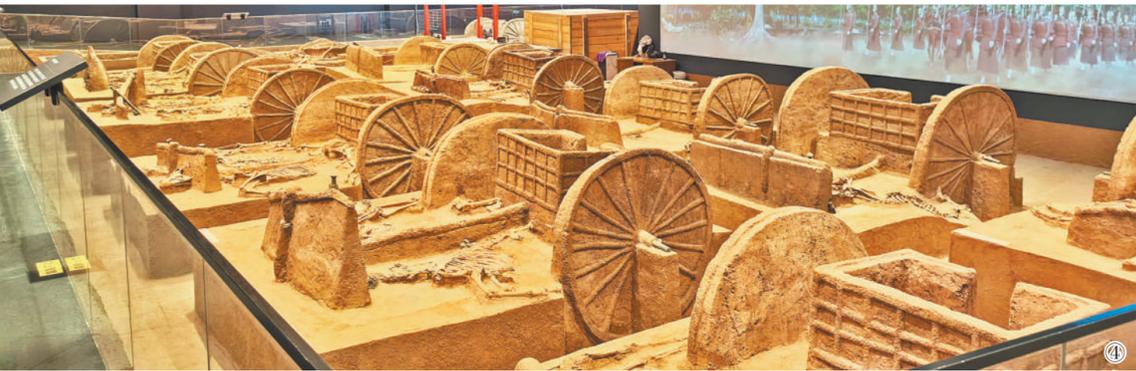
第三单元“万世师表”,展示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教育的贡献,在促成民族文化认同方面的作用,以及儒家学说在东方儒家文化圈形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传入欧洲后的影响。“有教无类”教育理念不仅推动教育普及,为隋唐以来科举选拔人才提供了可能,并进而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考试选拔制度,而且让来自不同族群的人都可能通过学习提高自身民族文化素质。在展厅可以看到,各种儒家经典在清代被译成满文、藏文、蒙古文等多种文字,用于教育人民。来自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的文字图屏风由“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扇组成,图文结合,将儒家思想作为主题绘于其上。另有一件展品则是欧洲传教士把儒家思想带回欧洲后在17世纪的出版物上的孔子像插图。历史上,以孔子儒家思想为纽带,中国与世界很早且很好地开展了交流与交往。直到今天,博大精深的儒学也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纽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包括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儒家倡导以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这种价值观念的具体表达,这也是展览名称的来源。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策展人)

大道之行 文脉流长

王光尧



图①:孝民屯铸铜作坊出土的铜圆尊陶范。图②:妇好墓骨笄。图③:洹北商城考古队在田野发掘。图④:殷墟博物馆的车马遗迹展。以上图片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提供



《伏生授经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供图

版式设计:张芳曼